



■关志雄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1957年出生于香港，197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课程毕业，其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产业研究所任职，2004年起就任现职。

著书《共存共荣的中日经济》、《中国经济革命最终章》、《推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中国第一》、《中国两个陷阱》及《中国新常态的经济》等。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给日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011年之后，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从以往10%左右的高增速转为7%左右的中高增速，由此进入了被称为“新常态”的新阶段。虽然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经济结构正在经历重大转变。生产方式方面，从扩大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转向通过创新等提升生产率；所有制方面，从国有企业转向民营企业；需求方面，从投资转向消费；产业方面，从工业（第二产业）转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新增长引擎的出现，也给日企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从扩大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转向提升生产率

近年，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老龄化），中国出现了劳动力不足，这导致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率也因此放缓。潜在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量的扩大”、“资本投入量的扩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个部分。劳动力不足意味着劳动投入量的减少，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降低则导致投资减速，依赖生产要素投入量扩大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再加上工资上涨，中国逐渐丧失了以往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的优势。为阻止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下滑，就必须通过创新提升生产率。

诚然，中国有“山寨”问题，“中国制造”给人低价低质的印象也存在已久，但近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骤增，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进展不容忽视。

中国的创新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单纯依靠引进海外技术的模式，进入注重自主研发的阶段，其主体也从国有企业转向民营企业，海外对中国创新的评价也随之迅速提升。

首先，从国家整体情况来看，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12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5位（瑞士、瑞典、英国位居前三，美国第4位、日本第16位、俄罗斯第43位、印度第66位）。

其次，在产业层面，中国随着创新能力的提高，部分高科技产业实现了快速增长。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列举了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八大产业。（Swanson, Ana, "Eight Innovative Industries China Does Better than Anywhere Else," *Forbes.com*, November 30, 2014）。

- 1 网络微支付
- 2 电子商务
- 3 快递服务
- 4 网络理财产品
- 5 廉价智能手机
- 6 水力发电
- 7 DNA 测序
- 8 高铁

再次，在企业层面，在波士顿咨询集团评出的《2015年全球50大创新公司》中，中国有三家企业入围，分别是腾讯（第12位）、华为技术（第45位）、联想（第50位），均为民营企业。

2、从国有企业转向民营企业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这样的特征，国有企业在夕阳产业中所占比重高，而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中所占比重高。前者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等资源及重工业领域，许多国有企业由于产能过剩，债务过多，业绩迅速恶化。对政府来说，维持包括部分“僵尸企业”（指生产效率和收益率低，本应退出市场却因债权方或政府支持得以存活的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将成为重负。

与国有企业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信息通信领域。中国互联网协会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 2016 年 7 月发布的《2016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中，前十名被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民营企业包揽。也有一些高科技领域的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如以基因解析著称的华大基因（BGI），航拍无人机闻名的大疆创新科技（DJI）。

3、从投资转向消费

在中国，投资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两者之间差距最大的是 2010 年，前者占比高达 47.2%，而后者仅为 35.9%。然而此后，居民消费的增速超越 GDP 的增速，居民消费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也开始上升。劳动力不足引起的工资上涨和收入差距的缩小推动了消费的扩大。

近年来，由于劳动力从过剩转为不足，工资增长率高于 GDP 增长率（均为名义增长率），劳动分配率（劳动收入在 GDP 中的占比）也从 2011 年的低谷回升。一般来说，消费倾向（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与收入水平呈反比，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反之收入越低消费倾向则越高。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收入会向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层集中，从而抑制社会整体

的消费倾向。反之，如果贫富差距缩小，整体的消费倾向就会提高。劳动分配率的上升，意味着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过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推动消费的扩大。

4、从工业转向服务业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的重心会由第一产业（农业）转向第二产业（工业），进而转向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国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例在 2012 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 年达到 50.5%。这个水平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低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国家，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在中国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服务业的重要性，2013 年 5 月 29 日，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以《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为题发表了演讲。他指出，现在中国许多工业产品供过于求，但是仍有许多服务业却供不应求。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业水平，可以释放内需潜力，形成稳定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也会对经济结构优化做出贡献。大力发展服务业，不但有利于实现就业，更利于环保和可持续的增长。

除了信息、旅游、护理等生活性服务领域以外，政府还强调优先发展研究开发和设计、商务服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领域。

5、日本企业必须调整对中商务战略

伴随“新常态”出现的以上变化，给日本企业带来了不少机遇和挑战。

首先，虽然中国的增长率较以往大幅下降，但依旧比其他国家高出很多，因此中国在世界 GDP 中所占份额将会继续上升。部分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日本企业，开始实施“中国+1”战略，将投资从中国转移到

其他新兴国家，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然而，欧美企业却积极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长此以往，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就很有可能被欧美企业所占领。

其次，结合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日本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将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劳动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等国的同时，在中国扩大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这对东南亚以及印度等新兴国家来说，是一个利用直接投资加速本国工业化的良机。但对日本来说，国内产业空洞化的担忧将会进一步加剧。为避免这一现象，日本也应和中国一样，不断开拓新的增长领域，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再次，迄今为止，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国有企业，今后如何建立与迅速发展的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将成为关键。合作范围正从以往的贸易往来和日企的对中直接投资，扩展到对中国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以及中国民营企业对日本企业的并购。

复次，中国以消费为中心的内需正在不断扩大，这对日本企业来说中国不仅是生产工场，其作为市场的重要性也在与日俱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平民市场的增速将高于富人市场。除向中国出口、本地生产本地销售以外，中国访日游客的“爆买”也成为部分日本企业的重要收入来源。

最后，以往日本企业的对中投资以制造业为中心，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重心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投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尤其在现代服务领域，中国为吸取最尖端的技术和经营模式，需要积极加强与外国企业的合作。中国对外资准入限制的放宽，意味着日本企业在金融、物流、通信等领域大展身手的机会将会增多。

因此，日本企业应做的不是在中国缩小业务或是从中国撤退，而应顺应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重新调整对中商务战略。